為文恥與世人同

王兆貴

近年來，關於抄襲、剽竊他人成果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抨擊的呼聲也一浪高過一浪。抄襲行爲不僅存在於學術領域，在報刊雜誌上也時有發生。據網友們揭發，有些人把別人網上的帖子或是已發表的稿件克隆下來，改頭換面後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別處發表，以賺取稿費。對於竊取他人稿件的「慣犯」，被網友們叫作「文賊」、「剽客」，有些網友還自發地評出了中國「四大剽客」。

甚荒唐的是，竟然還有人出面，爲抄襲行爲進行辯解，含蓄地稱之爲「過度引用」。衆所周知，將他人成果據爲己有的行爲，與偷竊沒有本質的不同，但與模仿、引用還是有嚴格區別的。初涉文途的人，免不了參照範文，從模仿起步，但不能止於模仿，更不能以模仿代替創作，要學會說自己的話，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修文治學的人，有時也需要旁徵博引，徵引目的是爲了佐證自己的立論，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說服力。引用他人的著述，一是要尊重他人勞動，註明出處，二是要深入闡發，化爲自己的文思，生發出新的創意。魯迅曾提倡過「拿來主義」，這「拿來主義」是把他人的東西拿來爲我所用，而不是爲我所有。

追溯起來，抄襲現象自古有之，中外皆然，並不鮮見，也並不奇怪。不過，在從前，因爲沒有今天這樣瞬息間通達天下的傳播條件，抄襲現象也沒這麼嚴重；因爲沒有今天這樣明朗的版權意識，人們對抄襲者比較客氣，委婉地把這種人稱之爲「文抄公」。客氣歸客氣，嘲諷的言論卻也從未止息過。據《唐詩紀事》和《大唐新語》記載，棗強縣尉張懷慶，喜好偷搬名人詩句，改頭換面，拼湊成自己的作品，以充風雅，被人戲謔爲「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在我國古代，但凡有作爲的文人，都主張自出機杼、別開生面，對那些生吞活剝他人著述的現象，一向恥於掛齒。北魏祖瑩，以才名拜太學博士，累遷國子祭酒，精通金石雅樂，以文學見重。他曾經對人說：「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南宋戴復古說：「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後行。」類似的話語，我們在西晉陸機、中唐韓愈、北宋蘇軾等名家的文稿中都能看到。古人不僅反對抄襲和剽竊，就連依樣畫葫蘆的模仿也不贊成。清代黃宗羲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爲眞，凡依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陸機則更謹愼，他在《文賦》中說，「雖枉軸於予懷，恤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衍義，亦雖愛而必捐。」意思是說，即便出於自己的創意，仍要戒懼此前有無先例，倘若發現雷同，落入他人窠臼，寧肯割愛也在所不惜。

北宋時期的王安石，不僅在政事上主張變法圖新，在文章上也主張立異標新。他也認爲，文章當別出心裁，倘與別人趨同，就是世俗之作，留它不得。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時，有一次劉貢父來訪，正碰上他用餐，門人就把貢父領進書房候見。貢父見硯台下壓着一疊關於論兵的書稿，就隨手翻了翻。貢父記憶力很強，看過的文章基本上能過目不忘。看完之後，便放回原處，踱出書房，轉到廊下等候。飯罷，王安石請劉貢父到書房敘談。寒暄數語後，王安石問他近來在寫什麼文章。劉貢父平素喜歡玩笑，於是就說，也沒什麼，不過寫了一篇《論兵》，還沒完稿，容後請您指教。王安石一聽書名與自己相同，頗爲詫異，忙問他寫了些什麼內容。事已至此，貢父又不便直說，只好把剛才看過的大概覆述了一通。王安石聽後良久無語，隨後便把硯台下的那篇書稿抽出毀掉了。在有建樹、有成就的我國古代文人中，像王安石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他們這種「爲文恥於世人同」的治學精神，熏陶並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於今仍然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如果我們連趨同都能怵惕和戒懼，又怎麼會發生抄襲、剽竊之類的醜聞呢？

遠超欺君之罪

春璇

鐵凝的最新長篇《笨花》，寫到北洋軍閥年代的兵變。帶兵的高官貪腐無度，兵士領不到軍餉，於是去搶百姓，造成惡劣影響，令中國在國際上丟臉。上峰後來對這些士兵的處罰也極爲嚴酷，先是談判安撫，鼓勵解甲歸田，騙他們登上悶罐列車，駛到一小站，就集體槍殺。其實，兵匪血液裡「搶百姓」的文化基因，最早是北洋軍閥老祖宗袁世凱種下的。民國元年，孫中山派蔡元培、汪精衛和宋教仁赴北京恭請大總統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但袁死賴在當地，就是不肯南下。他對手下說「總得想一個法子，對付他們一下子」。袁世凱等想出的法子就是撤去崗警，讓駐軍掠奪北京城，再以平定亂局爲由，拒絕孫中山的請求。

這就是當年「北京兵變」的緣起。幾千兵匪如同大群餓狼撲向社會，搶掠者最先光顧的就是銀樓一類商家。如此一來，袁世凱的衛兵也無心站崗了，覺得吃了大虧。爲穩定護衛「軍心」，袁世凱通知他們去庫房領金元寶，每人兩個。這種每個重五十兩的金元寶，很多當兵的一輩子都沒見過，手上捧過之後，連舉槍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場北京兵變由曹錕具體策劃，事後從袁世凱那裡領到十二尊金佛，大多是實心的，就是空心的，裡面也藏有珠寶。

近年學界有人重評北洋軍閥，認爲他們也有一些善待大學校長及教授的舉動，值得肯定。可是，這些「善舉」怎能抵銷北京兵變的惡名昭彰？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百姓含辛茹苦、省吃儉用供奉國家軍隊，而軍人的天職就是保護百姓不受外敵欺侮。所以，從「民爲貴，君爲輕」的論述來看，國家軍隊擄掠百姓犯了滔天大罪，其行爲遠超欺君之罪，甚至比背叛祖國更不容饒恕。問題是，這些擄掠百姓、製造天下大亂、刁難政敵的念頭，卻誕生於袁世凱等國家領袖心間，其冷血與卑劣的程度，可能在人類罪惡史上也屬罕見。

我心安處

馮進

汪曾祺老家蘇北高郵，曾經津津樂道地寫過故鄉的鹹鴨蛋和其他菜餚。可是汪氏自己少小離家，二十來歲時流離顛沛，除寄居昆明的西南聯大以外，他也在上海住過，「文革」時期下放到張家口的農學研究所，最後終老於北京。在他的筆下，每個不同的地域都代表了他人生的一段歷程，而每個生命的瞬間都可以用不同的食物來標記。

他對西南聯大時期的回憶圍繞着山間的野菜菌菇，街頭叫賣的玉米粑粑和椒鹽餅子西洋糕，描繪的是民生困苦但「胃口卻像刀子一樣」的青年時代。然而，寫吃即寫人，不光是沈從文，金岳霖，林徽音這樣的大腕人物在文中若隱若現，就是洗衣服撿破爛的小人物也無一不是栩栩如生。《日規》寫的是一位埋頭苦讀的青年學子蔡德惠，吃不飽穿不暖，但自己動手做了一個古樸的日規，「一半是爲了看時間，一半也是爲了好玩，增加一點生活上的情趣」。衆人都覺得「這個現代古物和一個心如古井的青年學者，倒是十分相稱的」。然而，因爲肺結核，因爲營養不良，他死了。他的教授高崇禮，平時靠太太種劍蘭拿到市場上賣才能讓全家吃上肉，這天聽到了他的死訊：「氣鍋蓋噗噗地響，氣鍋雞裡加了宣威火腿，噴香！高崇禮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雞湯，他也許不會死！這一天晚上的氣鍋雞他一塊也沒吃。」這個結尾總讓我想起孔子聽說子路的死訊後撤掉桌上的肉糜那一幕。可是，這篇小說寫得更深一層：這裡不光是描摹師生情意，更是彰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離亂年代，食物是何等生死攸關的大事。

《雞毛》裡頭寫到的則是西南聯大一個外號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學生，「其特異處有以下幾點：一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着；二是從來不買紙；三是每天吃一塊肉。」「他按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聯大爲師生洗衣服餬口的貧婦」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裡。每夜用完了功，就打開壇蓋，用一隻一頭削尖了的筷子，瞅準了，扎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後，躺在叮叮噹噹的雜物之下，酣然睡去」。可是這個學生，竟然偷偷吃了洗衣婦文嫂辛辛苦苦養大的雞，偷食不說，而且用文嫂的鼎罐煮，吃完了還是洗也不洗就還回去。正如作者喟嘆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如果說汪曾祺西南聯大時期關於食物的文字總是和飢餓的感覺難解難分，那麼他筆下北京和上海的吃食就是難以磨滅的京派和海派生活的印記了。《晚飯後的故事》寫一個京劇演員因爲「參加革命」發跡了，娶了一個高官做太太，自己也青雲直上，生活「是平穩的，柔軟的，滑潤的，像一塊奶油」，可是抹不去的是他的草根口味。他的晚飯還是「就着一碟豬耳朵喝了二兩酒，咬着一條頂花帶刺的黃瓜吃了半斤過了涼水的麻醬麵」，他懷念的還是貧民時代「放了好些牛肉，加了半勺油」的炒疙瘩和「油汪汪的蛋炒飯」。至於上海灘上的時髦人，雖然也跳交誼舞，喝「中西合璧的雞尾酒」：十幾瓶汽水，十幾瓶可口可樂，兌上一點白酒，可是眞吃起來並不總是那麼摩登斯文。除了老城隍廟的油汆鮎魚，雞鴨血湯這些平民小吃，《星期天》裡還描寫了一位食量極豪的上海教師：「他一輩子不吃任何蔬菜。他每天的中午飯都是由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在這個學校讀書）用一個三層的提樑飯盒從家裡給他送來（晚飯他回家吃）。菜，大都是紅燒肉，煎帶魚，荷包蛋，香腸……每頓他都吃得一點不剩，因此，他長得像一個牛犢子，呼吸粗短，舉動稍欠靈活。他當然有一對金魚眼睛。」可是最耐人尋味的是《星期天》無關食物的結尾：「在沉重的生活負擔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氣質，端莊的儀表下面隱藏着的兌詩意的，浪漫主義的幸福的熱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嚮往。」我總疑心這是夫子自道，汪曾祺寫食物，寫故鄉，寫回憶，何嘗不是在寫他本人對平淡生活中詩意和美麗的追求呢？汪氏的安身立命處，不在故鄉的食物，終究還是在寄託心緒的文字啊。

（《汪曾祺美食美文》之三，全文完）

北洋水師三巨艦歸宿尋蹤

黃元

巨艦：堅船利炮震驚日朝野

洋務大臣李鴻章興建北洋水師之初，通過中國海關總司赫德向英國阿姆斯壯造船公司購入用於近海防禦的小噸位炮艇，俗稱「蚊子船」，後又購進可作遠洋作戰的巡洋艦「超勇」與「揚威」。李鴻章對赫德其人與這家英國公司大爲不滿，由是將目光轉向他處。

一八八〇年，李鴻章命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在德國伏爾鏗（Vulcan）造船廠以二百八十三萬兩銀和六十八萬兩銀的造價，督造兩艘長九十四點五米、寬十八米、吃水六米、排水量七千六百七十噸、航速十五節的鐵甲艦（Steel Battleship）與一艘長七十二米、寬十點四米、吃水四點八米、排水量二千三百噸、航速十五節的穹甲巡洋艦（Armour Deck Cruiser）。李鴻章親爲三艦擬題艦名——「定遠」、「鎮遠」和「濟遠」，分別於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與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下水。軍艦造竣之時，適值中法在越南發生戰事，嚴守中立的德國拖延交貨日期，直至中法停戰議和，才將三艘軍艦移交中國使用。

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接替李鳳苞任出使德國大臣的許景澄來到基爾港，先是祭天然後登艦，爲三艦船員餞行。三艘軍艦共僱外國水手官兵四百餘人。典禮完畢，軍艦拉響汽笛，開始了駛向東方古老帝國的航程，於十月抵達天津大沽港。三艦爲當時「世界第三艦」，僅次於英國「英弗來息白」號（Inflexible，長一百零四點八五米）和德國「薩克森」號（Sachsen，長九十八米）。一八八六年八月，北洋水師出訪日本，軍艦停泊於日本長崎港。大清國堅船利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驚恐。日本軍部遂以三艦爲假想敵，加緊海上軍事訓練，尋找機會同北洋水師一較高下。

鎮遠：拆解展覽羞辱中國人

近代史稱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但中國擁有了眞正的堅船利炮，卻仍難逃喪師辱國的命運。這恐怕是李鴻章們所始料未及的。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鎮遠」艦在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海域與日軍主力遭遇，戰鬥十分激烈。管帶林泰曾帶領全艦官兵宣誓：「艦存與存，艦亡與亡。」配合「定遠」艦作戰，與日軍五艦拚殺，重創日艦「西京丸」。「鎮遠」亦多處受傷，然仍一面救火一面抵敵。

十月十七日，「鎮遠」艦駛入旅順港，不愼觸礁受傷。這時旅順船塢已被日軍攻佔，「鎮遠」艦致傷上千處，無處修理。林泰曾，這位訪日時被日本海軍界譽爲北洋水師「寶刀」的大清海軍將領，以「戰局方棘，損傷巨艦」引咎含恨自殺，年四十四歲。「死之日，知與不知，咸爲扼腕」。楊用霖接任「鎮遠」艦管帶。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部下推舉他出面與日軍接洽投降，楊用霖嚴詞拒絕，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自殺殉國，年四十二歲。二月十七日，「鎮遠」艦被日軍擄去，編入日本艦隊，成爲日本海軍第一艘鐵甲戰列艦，參加過在神戶舉行的海軍大校閱，服役日本海軍十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六日被拆解出售。令人髮指的是「鎮遠」艦所遺鐵錨、錨鏈被日本政府陳列於東京上野公園，以此羞辱中國人。一九四七年，鍾漢波將軍以聯絡官身份赴日，用「二戰」期間被日軍擄去的中國海關緝私船「飛星」、「隆順」接運「鎮遠」艦受盡屈辱的遺物回國，一雪甲午之恥。但是國民黨腐敗，有人竟將「鎮遠」艦三百噸錨鏈當作廢鐵賣掉。海軍名宿曾國晟偶然在鐵匠舖見到這批錨鏈，問明原委，長歎一聲，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投奔共產黨，加入人民海軍的行列。

濟遠：遭遇水雷海葬洋頭窪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濟遠」艦護送兵船去朝鮮返航途中，與日本巡洋艦「吉野」、「秋津洲」、「浪速」在豐島附近海域遭遇，展開激烈戰鬥。大副、二副相繼中彈身亡，管帶方伯謙駕艦西撤；水兵王國成、李仕茂以尾炮擊退追擊之日艦「吉野」。

在九月十七日的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居中，「濟遠」位於左翼。北洋水師旗艦「定遠」中炮起火。與「濟遠」同處左翼的「致遠」上陣掩護，中彈甚多；方伯謙駕駛「濟遠」退避，脫離戰陣、返回旅順。提督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方伯謙「實屬臨陣退縮，應即行正法，以肅軍紀」、「若不嚴行參辦，將無以儆效尤而期振作」。九月二十五日，方伯謙在旅順伏法。林國祥接任「濟遠」管帶，然在戰鬥中無所作爲。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日軍攻陷劉公島，「濟遠」艦與北洋水師其餘九艘軍艦一起被俘，編入日本海軍序列，林國祥被革職。一九〇四年，「濟遠」艦參加日俄戰爭，駛向旅順口海域。十年寄人籬下風塵輾轉，終得脫離東瀛返歸故里之機會，不意於十一月三十日被俄水雷炸沉於洋頭窪海域，距旅順西海岸一點九浬，水深四十六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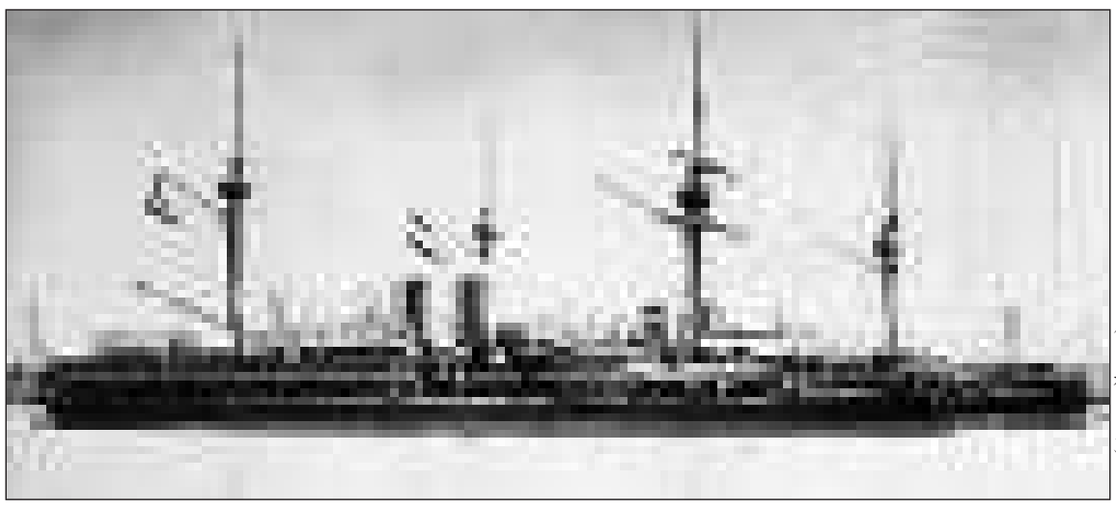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國家旅遊局兩次撥款三百萬元，用於「濟遠」艦打撈工程。威海市文物旅遊部門委託煙台救撈局救撈工程隊和江蘇海洋工程公司探摸打撈，共出水前主炮、速射炮、主桅杆、主錨、絞車、吊艇架等文物一百三十二件組，計三百餘件，經保護處理，陳列於山東威海劉公島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供人們參觀憑弔。

定遠：悲歌一曲自沉威海灣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中日兩國海軍主力在黃海遭遇，展開激戰。「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指揮軍艦英勇作戰，「不稍退避」，重創日軍旗艦「松島」號。劉步蟾因功升任記名提督；提督丁汝昌負傷離艦，劉步蟾代理提督。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定遠」艦被偷襲威海港的日軍魚雷艇擊傷，擱淺在劉公島東部淺灘上，進水嚴重。爲防戰艦落入敵手，丁汝昌、劉步蟾於一月十六日下令將「定遠」艦炸沉於威海灣。劉步蟾目送心愛的戰艦慢慢下沉，舉槍自殺殉國，實踐其「苟喪艦，必自裁」的誓言，年四十四歲。「定遠」艦是北洋海軍——中國第一支眞正現代意義上的海軍艦隊——旗艦，噸位大、裝甲厚、主炮火力猛，與「鎮遠」艦、「濟遠」艦一起，雖生命短促，卻見證過北洋水師建軍的輝煌，凝聚了太多的榮耀與悲壯。「定遠」艦部分殘骸，一八九六年由日本打撈。日本好戰分子、退職香川縣知事小野隆介出資兩萬日圓（合今二千萬日圓），從日海軍軍部購得被視作戰利品的艦艇殘骸，拆卸大量材料，建造了一所名爲「定遠館」的別墅。別墅大門以「定遠」艦二十厘米厚的艦體甲板製作，上邊依稀可見當年鏖戰留下的彈痕。小野此舉，目的不言而喻。爲使今人不忘歷史、牢記國恥，二〇〇二年山東威海市斥資五千萬元，由中船重工七〇一研究所以一：一比例，按「定遠」艦原貌複製、再現清末北洋水師這艘旗艦的風采。二〇〇五年，紀念艦停泊於威海港北碼頭，與劉公島隔海相望，成爲威海市一道靚麗風景與標誌性人文景觀。

「定遠」，永不沉沒的北洋水師「遍地球一等之鐵甲艦」！



北洋水師「定遠號」原貌（資料圖片）

乞得蕭閑是幸人

馬斗全

因中鎮詩社等單位在陳廷敬故里皇城相府舉辦陳廷敬詩研討會，於是抽時間讀了陳廷敬詩。有清一代文人做官最成功者莫過於陳廷敬，二十進士及第，終生在朝作官，任過五部尚書，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以至老死於閣中。陳氏是一位功力很深的詩人，大概因爲仕途太輝煌了，又因編纂史書和辭書而以學問著稱，所以其詩名不大爲人所知，以故有人讀陳廷敬詩後題曰：「此身終自屬君王，才富還因修纂忙。已解榮名都是累，故將詩譽讓漁洋。」至於他晚年詩中欲致仕還鄉之情，就更不爲人知了。我讀陳廷敬詩，最愛讀的，或曰最爲關注的，便是他生命最後幾年的《歸去詩集》。

詩與日記一樣，最能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陳廷敬早在五十來歲時，就作有《歸樵圖》，而萌歸去之意。年過七旬後，老詩人數次上書乞歸，希望致仕回陽城山中，安度晚年，與弟兄們團聚，以享天倫之樂。「若問午亭歸老處，析城山下是陽城。」可憐的老詩人連夢中也想着回陽城老家，甚至數次打點好行裝，誰想卻總是得不到恩准。「兩字愁聞是富貴」。「乞得蕭閑是幸人」，是其心聲。「頗惜剡中風景好，金堂玉室竟何如？」「長條誰挽牆邊柳，只送春歸不送人！」寓着多少愁和感。若非身處其境者，非年至遲暮者，是體會不出老先生這般苦衷的。他這一時期詩作，已看不到一位朝廷重臣的責任與抱負，只能看到一個思鄉者的欲歸之心和無奈之情。他所以一天也不想在朝中待了，一方面是想歸家過幾天消閒日子，也「遁跡山林」、「把犁東皋」、「雲山放浪」，一方面還有激流勇退、不想再提心吊膽在朝爲官的原因，「身退還因晚節難」、「省事遠危機」，是其所慮。竟至「夜多噩夢」而「辦歸裝」。所以陳廷敬非常羨慕陸游晚年得蕭散鏡湖邊，而有詩感嘆。

康熙皇帝因器重陳廷敬而不放其歸去，但他哪裡知道臣下的苦衷。後之讀者，若不讀陳廷敬的《歸去詩集》，也決不會知道陳廷敬暮年竟是如此心境。他最後病重時所作絕筆詩，還說「認得雲歸處，天涯盡太行」，至死仍想着他的陽城老家，讀來令人悲愴。所以我《題陳廷敬〈歸去詩集〉》詩爲：「鄉心一片與誰論，長憶兒時午壁村。得遇恩崇原是害，可憐到老不歸根。」

童芷苓演「賽觀音」

鄧小秋

京劇名旦童芷苓，是位多才多藝的優秀演員。她的老師很多，最早受到王瑤卿的器重，對她悉心培育。後又拜荀慧生爲師，得「荀派」藝術眞傳。十七歲到上海演出後，投入梅蘭芳門下，鑽研「梅派」藝術。還曾經學習「程派」，演出《鎖麟囊》等劇。由於她博採衆長，表演上不拘成規，善於將傳統技法的運用與人物性格的刻畫相結合，塑造了許多性格迥異的舞台形象。除以《大劈棺》、《紡棉花》享譽劇壇外，還曾經成功地演出《金玉奴》、《紅娘》、《尤三姐》、《武則天》、《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等名劇。童芷苓愛好廣泛，喜愛各種藝術，經常與話劇、電影界人士交往，相互切磋，頗有心得。建國前，還曾經參加電影《夜店》的拍攝。

電影《夜店》，描寫的是舊租界時代的上海，在一家小客棧中，住着一群生活在最底層的小人物。表現了他們之間相濡以沫、艱辛度日的悲劇生活。這部電影，由佐臨導演，石羽、石揮、周璇、韋偉、張伐、高笑鷗、崔超明、程之等明星主演。當時，童芷苓在上海演出，非常走紅。經過石揮的介紹，黃佐臨導演決定邀請童芷苓加盟，在片中扮演「賽觀音」一角。這個角色，是小客棧的女主人。仗着丈夫「聞太師」的惡勢力，欺負那些貧窮的租客。妖艷潑辣，恣意放蕩。既很兇狠，又很能幹。童芷苓演來揮灑自如，個性鮮明，非常成功。雖然，京劇與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一種需要程式功夫，一種強調生活氣息。但是，聰明絕頂的童芷苓，掌握分寸，恰如其分。因而，電影放映以後，很博得人們的讚揚。

風風雨雨大報恩寺

季旭東

始建於明永樂年間，卻毀於太平天國戰亂的大報恩寺，最近一個時期在南京可謂名噪一時。這箇中的原委則是因二〇〇八年在據說是該寺遺址的地宮中出土了一個內裝藏有佛祖舍利鎏金銅塔的鐵函（箱）。在這之前，報恩寺在今天的南京似乎有些默默無聞。其實報恩寺在南京寺廟中曾佔有過重要一席，並一度名揚海內。

大報恩寺歷史最早可上溯到三國年間的高僧康僧會建造的建初寺，是用來供奉佛祖釋迦牟尼遺骨舍利子的，這也是南京最早的寺廟之一。建初寺內還建有一座阿育王塔，後寺與塔均毀於戰亂。南朝劉宋時，在建初寺原址上復建了以長干命名的寺廟。長干寺在宋、元時分別被改稱爲天禧寺與慈恩旌忠寺。到了明代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感到大明江山已穩，國力殷實，便決定將古長干里（今南京中華門南）的宋元舊寺改擴建成名爲大報恩寺的新寺以及寺內的高塔。朱棣建大報恩寺的目的有二：一爲報答自己的父母，以彰顯自己的帝位名正言順，二爲向來訪的各番邦使臣炫耀大明的實力。據史料記載，建這座寺與塔共徵用了十萬民夫，歷時二十年並花去了大明庫銀達二百五十萬兩之多。建成的大報恩寺規模宏大，僅寺中的塔就有八十來米高。塔以琉璃瓦蓋頂並包以金箔，在陽光下更顯得金碧輝煌。使大報恩寺名揚海內的原因當然不止是其建築的恢宏與精美，還與它的三怪與三絕密不可分。

與一般寺廟大門朝南開不同，寺門向西開是大報恩寺的第一怪。之所以會如此，民間的說法是明永樂帝爲標榜自己奪位有理，一直稱自己是正宮皇后馬娘娘親生。但實際上他卻是庶出的，這點朱是心知肚明的。他爲悼自己的生母，遂使寺門向西，以朝向其生母曾受難的鐵窗大牢。不過大報恩寺門朝西的眞正原因是寺的南北東面非河即丘，僅西面地勢平坦，便於進出。

寺塔居於寺中央是大報恩寺的又一怪，因爲寺塔一般是作爲寺廟附屬建築建在寺側或寺後的。大報恩寺塔建於寺中心是明成祖朱棣授意的，爲的是通過標新立異來凸顯自己皇位的偉大和施政的新穎。

大報恩寺還有一怪就是它不像其他大寺廟一樣並設報時的鐘鼓樓，它只有鐘樓。至於何以如此，有兩種說法：一是寺內原本是鐘鼓樓齊全的，後來鼓樓被雷擊毀，就只剩下鐘樓了。另一種說法是大報恩寺晚間燃有一百九十多盞明燈，使寺內亮得沒了晝夜之分，所以就無擊暮鼓的必要，從而也就不需要建鼓樓了。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尚待考證。

說到大報恩寺的三絕，首推當是它的鎮寺之寶肉身菩薩，它是清代寺內高僧越凡圓寂後做成的，又稱肉身舍利。據說當時參拜它的人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明末清初大書法家王鐸人稱神筆，他寫在大報恩寺院牆上的「莊嚴法界」四個大字每個一米見方，筆力千鈞，勁健灑脫，蔚爲壯觀，是爲此寺的第二絕。大報恩寺的寺產素齋小吃蜜餞梅豆是第三絕。這種梅豆是以青梅與紅豆製作的，吃起來先酸後甜，風味獨特。同時，大報恩寺位於長干里，而青梅又是梅豆的主料之一，這便應和了李白《長干行》中「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的詩句，且紅豆又與相思豆的別稱相同，故蜜餞梅豆便象徵了由酸到甜的愛情，成了早年間相戀青年男女來此地時，男方買來送給女方，使其芳心相悅之物。

大報恩寺儘管已完全毀於百多年前的戰火，但它卻在南京留下了一些與之相關的地名，如座落在寺塔遺址上的寶塔山庵與寶塔頂庵；曾經是爲建大報恩寺燒製磚瓦的場所所在地，現在有窯崗村、窯器庵、窯灣街這樣一些地名；今天的紅土塘與白泥地在當年建寺時，一個是因取燒製磚瓦的紅土而挖出的坑塘，一個是取製瓷用的白土之處……這些地名都曾見證過大報恩寺昔日的輝煌，因而也是大報恩寺留給後人們的一點念想。現在有人提議重建大報恩寺，但是不要說復建的新寺的歷史價值會遠不如原寺，即使新寺能做建得維妙維肖，可沒有了歷史歲月的打磨與歷史文化的積澱，它又能保有幾分原寺的風采與神韻呢？